

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 与政治共同体的重建

王建娥

内容提要 移民运动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由移民现象带来的社会张力,在现代历史的各个阶段和现代世界各个地区都普遍存在。本文从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移民问题与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内在张力、一体化进程中主流政党社会政策的缺位、移民问题与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矛盾等角度,提出了移民权利和政治共同体的重建问题,以及移民问题的解决与现代世界体系改造之间的逻辑联系。作者认为,后殖民时代的移民运动与以往移民运动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之间的角色互换,这种角色互换是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所在,也是移民问题成为世界关注之焦点的本质原因。

关键词 后殖民时代 移民问题 政治共同体 世界体系

一、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

移民运动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自1492年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以来,移民运动就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由移民建立的新国家构成了现代世界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移民现象带来的社会张力,在现代历史的各个阶段和现代世界各个地区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这种张力的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传统上,移民运动的方向是从中心向外围辐射。欧洲殖民者以欧洲为中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地网络,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欧洲殖民者“中心地区”的强大势力,外来移民与当地人的关系是一种以强凌弱的关系,当地居民的利益,甚至他们的存在,根本不在殖民者的考虑之中。来自欧洲的移民凌驾于当地居民之上,或强占当地居民的土地,消灭当地居民的传统;或瓦解当地居民的政府,将其置于欧洲殖民者的控制之下,强行置当地居民于下等地位。

与此同时,殖民者和由殖民者建立的国家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还采取了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手段,强行移入外来劳动力。美洲种植园中的黑人劳工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移民。殖民者根本不把他们当做“人”看待,而把他们当做奴隶主的商品在市场上随意买卖。这些移民根本没有“人权”,更谈不上有“公民权”。由于殖民主义的霸权,这种不公正的秩序被强加给了殖民地人民和新兴国家的外来劳工。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体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殖民主义体系解体,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

系的基本结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拉大,移民趋势也发生了从中心—边缘方向到边缘—中心方向的转变。移民运动不再建立新的国家,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移入国的人口构成。这个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以往移民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角色、地位发生了互换。移民目的地是那些在世界经济中居于发达地位,并以具有“优秀”文化和“优良”种族传统而自居的国家或地区;本土居民则是那些拥有公民权利和各种社会联系的国家成员。到这些国家或地区来寻找机会和前途的外来移民,大多数来自处于落后状态的前殖民地社会。

外来移民与当地社会之间的这种角色互换,是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所在。居于优越地位的当地社会高高在上,或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接受外来移民,视他们为一种必要的劳动力补充,而无意在政治上吸纳他们,使之成为当地社会的平等成员;或以一种狭隘的仇外心理对待他们,将他们看做就业市场的竞争者而加以排斥,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外来移民往往成为种族暴力袭击对象。无权无势、缺乏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利的外来移民被贬抑到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在几乎每一个西欧国家中,外来移民都从事着最苦、最累、最脏、最不受尊重、收入最低的工作。外来移民的边缘地位在任何发达国家中都是非常明显的。

更为严重的是,殖民主义的长期历史在欧洲社会培育了一种种族文化优越感;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养成了欧洲部分公民的利益独占心理。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独占心理和种族优越感严重地制约着现代公民的价值判断,败坏着公民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以至于它“仍然是一种能够被有效动员的潜在资源,能够发展成为排斥异己、穷兵黩武的沙文主义以及种族主义”。近年来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变化充分说明,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角逐政治权利的政党和个人野心家动员民众的一种政治资源。欧洲的一些右翼政党把剧烈的社会变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归罪于外来移民和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且把近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萎缩”归咎于外来移民,从而通过这种政治误导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在1999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以海德尔为首的自由党的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排斥外来移民,反对欧盟东扩。在竞选期间,他们在首都维也纳挂出了“反对过分移民”的海报,获得了许多害怕外来移民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会恶化自身就业状况的奥地利人的支持。在号称最爱好和平、崇尚自由平等的瑞士,右派人民党在2001年10月的大选中也曾喊出“停止滥用政治庇护”的口号,并且赢得超过两成的选票。在2001年的丹麦大选中,右翼自由党利用民众畏惧外来移民的心理,提出了“紧缩”外来移民的主张,获得了31.2%的选票,从而取代社会党成为丹麦议会的第一大党。更让人震惊的是,丹麦人民党的极度排外、仇外的政治理念在民众中也有市场,竟得到15%的选票,在丹麦议会179个席位中获得了22个席位。二者相加,具有排斥外来移民倾向的右翼政党竟得到将近半数选民的支持!

二、移民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张力

围绕移民问题产生的社会张力,即近年来在西欧社会中出现的对外来移民的拒绝与排斥,各国政府对移民采取的紧缩政策,以及以排斥外来移民为号召的右翼政治势力的泛起,这些都不是经济衰退时期在右翼势力鼓动下发生的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与民族国家和建立在民族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国家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在排外性相联系的,是与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社会的包容程度相联系的。

19世纪,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之时,犹太人因为是“无根”的外来移民集团,在欧洲没有一块世居的土地,缺乏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民族、族裔、土地三大要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受到欧洲民族国家政府的排斥和迫害。20世纪末,外来移民在欧洲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如19世纪的犹太人成为无法适应工业化带来的急剧社会变化的人们的反对目标一样,现代外来移民也成为那些无法适应“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急剧社会变化的人们的攻击目标。那些无法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人们把生活水平的下降归罪于外来移民,并迁怒于他们。

英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E·鲍曼认为,现代社会“建立在种族灭绝基础上,并通过更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而前行”。这种刺激公众神经的后现代话语并非危言耸听,它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利益实体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本质,道出了种族主义与现代世界政治的逻辑联系。现代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按照具有种族排斥性的“民族”概念,以及将这种概念具体化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性主张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架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从封建王国演化而来的民族国家,还是在多元帝国废墟上诞生的民族国家,其建构过程都充满了语言、宗教、种族、文化上的排斥和强制同化的痕迹,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使民族国家排斥性边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在对内扫除封建等级特权、提倡所有成员平等、消除内部封建割据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对本民族成员以外的人们的排他意识,造就了民族国家及其政治结构的内在排他性,在民族国家之间树立起更高的边界壁垒。

在西欧,民族国家和福利制度的建设以及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联袂而行的。随着社会民主化和福利国家的建设,公民权的内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传统的政治、社会权利延伸到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领域。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不仅可以享受到在民族国家疆域内的居住权和基本的人权,而且可以通过代议制民主的途径参与政治决策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享受健康、教育和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在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和强化共同价值观的同时,也助长了欧洲各国普通民众对公民权和社会福利的独占心理,把公民权与公民权相联系的各种社会权利视为禁脔,不许任何外人染指。近年来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激活了隐藏在公民内心深处的排斥意识。他们不仅担心外来移民的增加会减少自己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使原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而且担心这些“低劣”的外族人口的移入会危及本国的“优秀”文化和“文明”生活方式,威胁“文明”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和担忧,欧洲社会在接纳外来移民时才那样勉强和不情愿,并且不顾它长期标榜的平等、自由的人权原则,在外来移民入境和他们的公民权问题上一再加高“围墙”。

三、移民问题及其相关联系

移民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众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张力,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内在的排斥逻辑所使然;另一方面则与“全球化”和“一体化”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以及政府对多种社会矛盾和

[英]E·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牛津,布拉克威尔,1993年,第227页。转引自[英]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Stephen Castles, *Ethnicity and Globaliza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p. 170.

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政策相联系。在排斥外来移民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内容,远比排斥外来移民本身要复杂得多。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经历了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其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数量和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第三、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有人主张将知识产业从第三产业中独立出来,称为“第四产业”)所占的比重则逐年上升。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农民的重要性已经衰落,店主、小商人和工匠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专业人员数量增加。在欧洲,60%—90%的劳动力依靠工资为生,制造业部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0%—40%,传统的重工业部门发生部分解体,有组织的传统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失业现象呈上升趋势。

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盛行,西欧各国政府放松了对市场和经济活动的调控,在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补贴和福利支出的政策的同时,以改善投资环境的名义降低直接税、削弱转移支付机制,紧缩传统的社会保障领域,使人们享受社会福利变得困难。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政策的变化和外来移民的数量大增以及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恰恰都发生在同一时间。这种时间上的高度重合,加重了由这些变化引起的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压力,使失业现象更为突出,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贫困人口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特别是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主流政党的政策缺陷给右翼势力提供了可以利用和调动的“社会资源”。法国极右翼政党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就利用政府在本应根据老百姓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社会政策领域里的政策缺位,把民众对种种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不满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提出了“法国和法国人优先”的主张和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盟东扩、以铁腕对付犯罪、保护“小人物”和“穷人”的利益等竞选口号。2002年法国大选首轮投票后的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原来由左翼势力执政的城市和地区的工人、小商人,把选票投给了勒庞。

与移民问题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东扩。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地深入,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功能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边界开放、外交、安全、防御方面的主权向欧盟层次让渡的同时,市场、关税、货币、竞争规则和程序等宏观经济调控也在向欧盟层次过渡。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和各国政府不能充当欧盟条件下经济活动和市场的最终调节者、仲裁者。但是,当一体化带来传统交往关系的变化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组使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责任向上、向下转移时,作为政治共同体权利机构的超国家联盟的欧盟,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护、控制、调节措施,未能履行政治共同体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职能”。这一点为右翼集团反对外来移民和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口实。几乎所有新右翼政党都以国家、民族以及平民利益为号召,而当它们举起“国家”、“民族”和“新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反对外来移民、欧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时,又往往能够“奏效”。这种现象说明,在欧盟政治精英的决策与普通大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普遍要求以及对急剧的社会变化的心理接受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东扩的问题上,在边界开放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问题上,在司法一体化和就业市场、福利制度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欧盟的决策者在考虑用一体化和东扩来解决市场和劳动力问题时,对急剧的社会变革将会给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对欧盟东扩将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与对抗以及下层民众对这种竞争和对抗的心理接受能力,对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繁荣程度、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可能发生的龃龉与矛

盾,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以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选举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欧盟层次上的决策与选择能力的影响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心理准备。欧洲政坛上的风云变化固然反映了极右翼种族排外思想的作用,但也不排除民众对目前欧盟精英政治的不满和抗议,同时也反映出下层民众在急剧的社会变化面前的失衡和焦虑心理。特别是那些缺乏足够的文化背景和应变能力、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以及备受失业、社会福利缩减、治安恶化等问题困扰的社会低层民众,在失去国家保护的情况下和急剧的社会变化面前,存在一种恐惧、无助和无所适从的心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与人们的经济利益密切联系的地域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在这种民族认同背后隐藏着的排斥性还是很强烈的和不容忽视的。对外来移民和劳工的敌视与排斥现象,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困扰欧洲的政治生活。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东扩可能引起的社会变化以及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目前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对于其间可能出现的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时间去思考,去认识,去寻找解释和答案。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会影响到欧洲一体化倡导者们的初衷,成为欧洲一体化继续深入,进而实现“超国家实体”这一巨大飞跃的现实障碍。

四、移民问题与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矛盾

围绕着移民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张力不仅提出了民族国家的社会包容度问题,也提出了政治共同体的角色和作用问题。从更广阔的角度看,欧洲现在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全球性变化的一部分,其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即在全球性的资本—劳动关系的运动中,权利的砝码持续地向着资本一方偏移,劳动一方在这个天平上的分量越来越小。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国家对资本—劳动关系的干预越来越少,社会的民主化与公司管理制度的寡头化、专制化之间的巨大反差,吞噬了投票选举这一形式民主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劳动阶级和弱势群体成为这种反差的牺牲品。他们对现行制度和政府的政策不满,又没有合适的权利组织和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使他们走向对立的阵营,成为右翼政党和右翼团体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这个现象从反面说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反社会本质。应从社会共同体的角度呼吁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关注,要求政府制定积极的税收与财政政策、强化转移支付机制、加大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力度、增强社会问题领域的作为,而不应把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留给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去完成。与国家的政府机构相比,社会自愿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政治资源和行政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在这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欧部分民众支持右翼政党提出的一些口号,并不是对全球化的笼统反对,而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共同体(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社会调控机制失能和缺位现象的不满。当无助的弱势群体对主流政党的政策和说教失去信心和热情,对现行的政党政治和政策感到失望和厌倦,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深怀怨怼之时,他们很容易转向政府的反对派,把自己的选票投给那些是非观念极其模糊、政治主张极其狭隘的政治派别,以表达自己的敌对情绪,发泄心中的愤懑和抗议。众多的选民对传统主流政党的背离和抛弃,说明民众对主流政党的政策和能力产生怀疑,其“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打了折扣,因为“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

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失去了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它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基础。

更为严重的是,部分民众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敌视和暴力行为,说明西欧社会潜在的动荡和分裂因素已经开始浮出水面,成为社会稳定与安宁的现实威胁。2002年5月,荷兰大选中反对外来移民的极右翼政党领袖富图恩被刺事件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说明移民问题很可能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冲突的直接诱因,暴露出包括外来移民在内的少数民族群体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满,对公民权包含范围不充分的不满,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根据马克思·韦伯等人的社会冲突理论,权利、财富和声望的差异是产生社会冲突的前提。当生活在一定疆域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种族出身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被排斥于当地主流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不能和其他人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自己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并被当地主流社会视为异类时,他们必然会对这种政治制度和政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并且把这种怀疑变成现实的反抗。他们会寻找各种渠道发泄内心的愤怒和仇恨,甚至采取极端行为强行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而不会顾及社会的安危和普遍的道德。这正是欧洲近年来针对外来移民的暴力行为上升和移民下层社会犯罪率升高的深层原因。

围绕移民的地位和权利问题产生的社会张力,也促使人们对欧洲社会赖以自豪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对其代表整个社会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欧洲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作为欧洲民主政治之基本制度的代议制民主是通过政党政治的途径实现的。选举是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主要渠道,是各个政党获取权力的主要手段。右翼政党抓住选民关心的移民政策问题,迎合部分选民的意愿,争取选民的支持,从而通过合法手段进入政坛。这就使人对代议制民主制度本身的自足性提出了疑问,对民主制度的内涵、精髓和终极目的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人们从历史和现实中领悟到,不能简单地把代议制民主制度和与其相联系的投票选举这些获得民众意见的基本渠道和方法与平等及社会正义这些普遍价值等量齐观。在反对外来移民的口号下聚集起来的选票,暴露出民族国家自我设计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的排斥性。建立在这种道德伦理和公民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公民选举制度,本身就受到民族国家自身排斥性的限制,并且通过代议制民主制度这一渠道影响各个政党的政策取向。它并不具备防止专制、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的“免疫”功能,也不是社会正义和民主、平等制度的天然保障。在缺乏包容差异的普遍主义社会氛围和道德自律的情况下,在缺乏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平等、存在明显的社会分裂、部分社会成员被排斥在公民投票权和选举权之外的情况下,多数票原则既不能提供避免多数对少数的暴政、杜绝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保证,也不能防止它本身成为政治野心家操纵民众的工具。移民问题暴露出传统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提出了改造传统政治制度的迫切任务。

五、移民问题的解决与政治共同体的重建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在移民问题上集聚的深刻矛盾和社会冲突,归根结底是全球化经济、领土主权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它反映出流动经济、固定国界和排斥性民族认同这个现代世界的结构性矛盾,说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已经面临危机。从目前的情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来看,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浪潮将会长期保持由南向北的运动方向。这不仅是因为在现阶段世界人口的增长呈现地区性不平衡,北部富裕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长期呈下降趋势,人口增长主要是在南部国家,更是因为全球性的资本和人口流动是以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为基础的。南、北之间贫富悬殊,世界各地工资水平不一致,是资本和劳动全球性流动的最大压差和动力。这种压差驱动着资本不断地向工资水平低的地区流动,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劳动力不断地向生活环境较好、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运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移民浪潮即便不是由贫富悬殊引起的,也因此而变本加厉。”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性经济使资本拥有者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开办公司,设厂经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得高额利润,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与此同时,希望通过迁移改变生活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并且在事实上以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满足了移入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外来移民,却遭遇到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等因素的阻力。即便是已经进入移入国劳动市场的移民,也很难享受到移入国的公民权和社会福利保障。这个事实说明,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资本可以毫无障碍地跨越国界,对商品链上的重要环节形成垄断,在世界各地获取利润;而劳动力却缺乏基本的迁徙自由。它同时说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及其排斥性的本质,也没有使人们的认同和利益感悟以及利益单位的外延发生本质的变化。直到目前,全球化意味的只是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的全球流动和生产过程的全球联系。这种全球性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利润分配和再分配决不是无国界的,更不是以世界一体化为出发点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政府对全球性的人口、经济、环境政策的协调考虑,也同样是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当全球化经济和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时,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却对它构成了现实的阻力。民族国家的存在,它的疆界,它的主权,它的管理和干预经济与社会的能力,它对公民权利的控制,与在本质上要求“去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暴露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证明了那种“把社会认为是结构化的、有组织的、与民族国家界限一致的空间”的“现代社会理论”与全球化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现代社会对人类强加的限制”。正如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家 E·鲍曼所说:“现代社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在朝着普遍性进步,而实际上,它只是产生了大量不协调的、自我指引的(局部的狭隘的)合理性,他们变成了实现普遍合理秩序的主要障碍。”

移民问题暴露出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和世界体系的内在危机。但是危机并不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它蕴涵着制度转化和更新的可能,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以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移民问题暴露出的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症结所在,促使人们从公民意识、政治制度和社会包容的角度认识改造现存民族国家的迫切性,寻找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途径,通过重新探讨政治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重建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标准和公民道德体系,进而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造。鉴于建构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公民权以及公民权利独占意识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种族性的社会分化和排斥,人们已经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转引自(英)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第201—202页。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开始了对政治共同体的作用、角色及其认同标准的重新思考。越来越多的理性公民已经从社会冲突的现实中认识到,族裔身份的多样性和不同民族或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同一国家内的共存是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从而形成了消除排斥性、增进包容性、实现社会和道德重建的基本共识,并且意识到“道德重建的关键”是“对于共享责任和集体福利的重新发现”。如果大家都有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而不愿它在社会冲突中分裂、衰亡的愿望,那么“社会各集团之间就需要在身份认同上不断地进行协调并且不断地重新确定其标准”,探讨社会全体成员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的可行途径,创造适合各种民族文化背景的个人和群体共同生存、发展的政治空间和保障机制,保证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与要求在社会决策过程中能够被倾听、被考虑,从而创造一种真正的参与性、对话性的社会民主。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实现多元社会各个群体的共同繁荣与和平发展。更进一步说,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建立在种族主义观念基础上的民族排斥性,铲除世界性权利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消除工资水平的差异和南、北之间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创造出新的利益再分配机制和转移支付机制,才有可能实现民族集团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真正平等,实现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民问题的解决,为改造传统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结构、重建世界体系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契机。解决移民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世界体系和新的政治共同体的重建过程的一部分。而这正是全球化时代移民问题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Abstract Immigration problem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world history. Social tensions along with immigration generally exis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nd at every stage of history. Through a study of the essence of immigration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im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nation - states, the vacancy of the social policies of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the modern world's system,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right to immigr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and the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olution to immigration problems and the reform of the modern world's syste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mmigration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and that in the past is the exchange of roles between immigrants and the local society,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immigration proble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and also is the basic reason why immigration problems capture the world's attention.

(王建娥,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蔡曼华)

转引自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第210页。

Anna Triandafyllidou, *Immigrant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urope*, Routledge, London, 2001, p. 2.